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青年学者论丛

走向世界的新中国外交



陈少铭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青年学者论丛

走向世界的新中国外交

陈少铭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走向世界的新中国外交/陈少铭著.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12. 5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青年学者论丛)

ISBN 978-7-5098-1671-4

I. ①走… II. ①陈… III. ①外交—中国—现代—文集

IV. ①D82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4426 号

责任编辑:潘 鹏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100080

网 址:www. dscbs. 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145mm×210mm 1/32

字 数:97 千字

印 张:5

印 数:1—1000 册

版 次: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1671-4

定 价:13.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业务部联系
电话:010—82517687

序

欧阳淞

值此欢庆五四青年节之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青年学者论丛》即将问世。作为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主要负责人,我很乐意为这套丛书作序。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始终代表广大青年、赢得广大青年、依靠广大青年。2011年7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我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他满怀深情地指出:“我们党的队伍里始终活跃着怀抱崇高理想、充满奋斗激情的青年人,这是我们党历经90年风雨而依然保持蓬勃生机的一个重要保证。”2012年5月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向广大青年提出了坚持远大理想、坚持刻

本文作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

苦学习、坚持艰苦奋斗、坚持开拓创新、坚持高尚品行的五点希望。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着对广大青年的谆谆嘱托和殷切期望,使我们深受教育、倍受鼓舞。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也是我们党的未来和希望。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事业的未来和希望同样取决于青年。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高度重视党史工作,对广大党史工作者给予亲切关怀、寄予殷切期望。尤其是2010年党中央颁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召开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以来,党史工作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形势。新形势下,如何不断地以资政育人的新成效更好地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作出新的贡献,关键在人才,关键在青年才俊的不断涌现和茁壮成长。

党中央对党史工作的重视和关怀为青年党史工作者成长进步创造了良好条件,党史工作面临的光荣任务为青年党史工作者大展身手提供了广阔舞台。要实现党史工作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要认真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全党都要关注青年、关心青年、关爱青年,倾听青年心声,鼓励青年成长,支持青年创业”的重要指示精神,把培养造就一大批青年党史人才摆上更为重要的议事日程,进一步为青年党史工作者成长进步、建功立业提供良好环境和条件。

中央党史研究室成立30多年来,几代党史工作者中的大多数都是从青年时代就献身党史事业的。他们无私奉献、奋发有为,为党史事业发展贡献了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代又一代党史工作者退出工作岗位,进一步加强青年党史人才队伍建设,使他们尽快成长为党史研究和党史工作的骨干力量,进而成长为党史学界的名家、大家,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问题。组织出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青年学者论丛》,就是在党史系统贯彻落实中央有关加强青年工作要求的一次重要举措,也是为青年党史工作者成长进步搭建的一个重要平台。

这套丛书的第一批共有10册。每一册精选一位中央党史研究室青年研究人员在全国中文核心学术期刊上发表的部分党史研究论文。出版这样一套丛书,主要有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可以促使青年研究人员在收获时问耕耘,通过回顾自己的学术经历,总结成功经验,进一步明确学术目标,增强不断奋斗的自觉性;二是可以搭建一个增进了解的平台,将我室的青年研究人员介绍给广大读者,将他们的作品介绍给社会各界,并增进他们与党史学界同行的学术交流;三是可以使青年研究人员从广大读者的反馈意见中,寻找差距,弥补不足,优化治史方法,进一步提高研究能力和学术水平。

毋庸讳言,这套丛书会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对于青年研究人员来说,是他们成长道路上的一段经历的回

顾,也是一次“经风雨、见世面”的机会。毕竟,他们付出了努力,他们在成长、在进步、在成熟。故以“青年学者论丛”励之。

党史工作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希望广大青年党史工作者“坚定理想信念,增长知识本领,锤炼品德意志,矢志奋斗拼搏”,在党史工作宽阔舞台上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不断创造新的业绩、尽情展现人生价值,让青春在为党史事业的繁荣发展而矢志奋斗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2012年5月8日

目 录

.....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外交政策的演变	1
一九六九年“国际形势座谈会”及其历史贡献	20
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报告看中国外交战略 的发展变化	39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演变	59
新中国成立前后英国对华政策中的美国因素	87
从党代会暨中央全会报告看新中国外交战略的演 变及特点	116
后 记	148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外交政策的演变

1948 年底至朝鲜战争爆发前,中国共产党的对美外交政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尽管这些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对美外交政策的走向,但这一变化及影响这个变化的因素对于考察新中国的外交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

1948 年底至次年初,随着中国革命取得战略决战的胜利,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内战中的败局已定,一个重大而现实的问题提到中共中央议事日程: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 将建立什么样的对美外交政策?

1949 年 1 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对美政策成为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这次会议通过了《目前的形势和我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报告,指出:“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已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武装反共,转变为两面性的政策。即:一方面,支持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及地方军阀,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另一方面,则派遣其走狗混入革命阵营组织所谓反对派从内部来破坏革命。在人民解放军接近于

全国胜利时,甚至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办法,以求取得合法地位,实施这一‘内部破坏’的政策。”^①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扶蒋反共、破坏中国革命是美国的既定政策。美国承认中共政权只是一种策略和手段,要以取得合法地位为手段,来达到其从内部破坏的目的。作为应对策略,毛泽东认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对于这一帝国主义的阴谋计划,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性,并坚决地将其击破。”^②正是基于对美国的这种分析和认识,中国共产党决定不急于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说:“我们不要忙于求得帝国主义国家的承认,我们是反帝,是要打倒它,而不是承认它,将来我们要做生意,才发生承认与否的问题。我们也不忙于承认他们。”^③周恩来也在随后的发言中强调:“外交政策以不承认为好,对帝国主义国家要观察,根据需要将来再说。”^④应当说,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基本上确立了不急于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方针,这也为此间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定下了基调。

为了把对美外交原则转化成具体政策,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关于贸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8页。

②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31页。

③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9年1月6日。

④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9年1月6日。

易问题,指示也指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不要忙于去建立和恢复一般的贸易关系”。“只在对我有利、而有急需者,可与这些国家进行临时的个别的地方性的进出口贸易。”在这个指示中,对不急于得到西方国家外交承认的原因也作了较为明确的说明:“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①可见,为了摆脱旧中国外交的束缚,中国共产党对于将要建立的新政权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政策确定为“不急于获得承认”。

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报告中再一次谈及新中国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关系问题,他说:“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只要一天它们(美国等西方国家——作者注)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毛泽东再次对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采取不急于获得承认政策的原因作了说明:“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②

由于确立“不急于获得承认”的对美外交政策,需要得到国内民主人士的理解和支持,4月中旬,周恩来在向一部分民主人士作关于和平的谈判的报告时解释说:“如果急于要

^①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4—46页。

^② 《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80—81页。

求承认,就会陷于被动。”^①4月17日,周恩来在《关于和平谈判的问题的报告》中谈道:“我们的立场仍然是民族独立,平等相待。美国国会在吵嚷承认不承认中国。其实,这有什么了不起!即使你承认我,我承认不承认你还尚待考虑。”^②言外之意,不得到美国的承认,新政权仍然可以生存下去,中国共产党并不急于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4月25日,中共中央再次发出了《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就我方人员对外国大使馆人员的态度作了明确的规定:“我方人员对各国大使馆、公使馆及其中外交人员仍采取冷淡态度,绝不要主动地去理睬他们”,“不要和他们发生任何正式的外交往来。”^③可见,党在1949年初的对美政策是“不急于获得承认”,并在具体的外交政策指示中较为严格地执行这一政策。

当然,“不急于获得承认”的对美外交政策在执行上也不是僵硬不变的。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在其审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不承认外国在中国的正式代表为正式外交人员“实为理所当然”,但在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④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周恩来在报告中也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对美外交要做到“在政治上不排外,在军事上不挑衅,有理有利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541页;《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3页。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3页。

③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44页。

④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29页。

有节”。“在经济上,有买卖就做,国际贸易要开展,这是于双方都有利的。”^①

总之,这一时期为了使将要建立的新政权免受旧中国外交的束缚,从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中获得一个平等的外交地位,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不急于获得承认”的对美政策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策略的灵活性,并没有把中美之间进行接触,以至建立一种新关系的大门堵死。

二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党政权在中国统治的结束,中国的政治局势进一步明朗化。

形势的发展迫使美国不得不调整对中共的政策。早在1948年底,美国已经对中国内战的前景作了预测,认为国民党的消失只是时间问题,美国没有能力挽救它。1949年4月底,美国驻北平总领事柯布乐表示:现在是对共产党采取积极态度的时候了。我们应该向他们表明:“我们无意干涉内政,准备同他们在相互满意的基础上发展贸易关系,同时希望和新政权建立外交关系。”^②在解放南京时,还留在南京的美国大使,向我们的民主人士说,如果中国共产党政府愿意和美国建立联系,他不仅不走,而且美国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政府,还可以援助中国50亿美元。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3—324页。

^② FRUS, 1949, VOL. IX, PP. 1251—1252.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于新政权能否得到外交承认是相当担心的,毛泽东说:“我们如果建国以后外国三天不承认,就有问题了”^①。新政权迫切希望得到外交承认。而面对美国政府政策中显现的某些调整,从现实角度认识新政权与美国关系的中国共产党人,敏锐地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摇摆不定”并发生了“某些变化”。^②中国共产党人利用了美国的这种变化,果断地调整了对美政策,探求与美国发展关系的可能性,以扩大外交空间。

4月28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央军委给渡江战役总前委粟裕等人的电报,指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③,把同国民党政权断绝外交关系作为同美、英等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条件之一。4月30日,毛泽东在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起草的声明中,更加明确地谈到了党的外交原则:“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人民政府愿意考虑同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④。可见,形势的变化使中国共产党的对美政策转向了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同

① 师哲:《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经过》,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②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第17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76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85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1页;毛泽东在给中革军委的指示中也表达了同样的认识,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3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1页;《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5页;《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541页。

美国接触,寻求发展外交关系的可能,“不急于获得承认”转向了“有条件”地保持接触,以至发展对美关系。

对于中共领导人的表态,美国方面也表现出很大的兴趣。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一方面委托秘书傅泾波在香港经常写信同周恩来、邓颖超联系,^①要求与中共进行直接接触,另一方面,还致电美国国务院请求留在南京,以便于同中共建立“新的关系”。艾奇逊于4月6日复电授权他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会谈,并要他不要把话说绝。^②这也表明,美国政府也有同中国共产党政权进行接触的诉求。

5月,黄华出任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后,司徒雷登提出与他会面的要求。对此,毛泽东非常重视,并作了具体批示:“黄华可以与司徒雷登会面,以侦察美国政府的意向为目的”,“对于傅泾波所提司徒雷登愿意继续当大使和我们办交涉并修改商约一点,不要表示拒绝的态度”,对于司徒雷登在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友善态度“不要表示过分热情,应取庄重而和气的态度”。^③

随后,司徒雷登在同黄华进行几次直接或者间接的接触中表示,美国已经渐渐了解过去对于国民党认识错误,并且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同中共的接触也得到了艾奇逊的同意;美国愿意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并且建议将上海经济合作分署所存粮食、棉花等援助蒋介石的物资,待上海解放后

^① 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323页。

^② 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1辑,第24页。

^③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87—88页。

即移交新政权,以支援上海恢复生产,等等。^① 黄华也代表中国共产党表达了希望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同时强调了新政权发展与美国外交关系的原则。

但是,就在司徒雷登同中共接触期间,5月13日,艾奇逊致电司徒雷登,有所指地表明承认一个新政权应具备的三个条件:1. 该政府事实上控制该国领土和行政机构,能维持公共秩序;2. 该政府有能力并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3. 它的执政得到其国内人民的普遍认同。^② 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美国承认新政权的第一、第三个条件是中国共产党基本完成或者正在完成的事情,而对于第二个条件,则是中国共产党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是双方之间的原则性冲突:新政权准备与外国建立一种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而美国则要求新政权履行所谓的“国际义务”,以维护美国在华特权和利益,这注定了司徒雷登与中共的接触只能是无果而终。

6月初期,司徒雷登透露访问燕京大学的意愿,在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允许后,6月28日,黄华答复司徒雷登,欢迎他去北平访问燕京大学。6月30日,司徒雷登致电艾奇逊,寻求美国政府对于他北上北平的态度,并请求指示。在电报中,司徒雷登认为,黄华的答复可以视为是“毛和周发出的含蓄的邀请”,表面上是访问燕京大学,实际上是与中共会谈。接着,他对访问北平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并认为接受邀请无

① 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1辑,第25—26页。

② FRUS, 1949, VOL. IX, PP. 21—23;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4页。

疑会加深相互谅解。美国国务院对此事有较大分歧,艾奇逊遂将此事提交给总统决定。杜鲁门更多地从司徒雷登访问北平可能引起的不利后果来考虑而否定了此事。7月1日,艾奇逊在电报中告诉司徒雷登,你的6月30日的电报已经在最高层作了研究,“现在指示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①。中国共产党同美国的接触在刚刚开始后不久便陷入了僵局。

6月30日,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在对外关系问题上表明了强硬的立场:“……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②可见,中美之间外交原则的巨大分歧使得中共公开提出了“一边倒”政策。虽然有了这样的表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完全放弃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7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通过陈铭枢给司徒雷登传口信表示,^③6月30日的文章主要是为本党所写,主要是为了宣传,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后,这样的宣传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试图淡化“一边倒”文章所宣告倒向苏联一边的影响。根据胡乔木的回忆,在7月初,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他也曾代表中共中央把中共的基本意见和考虑向苏联方面作了通报,表示中共方

① 陶文钊主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册),第101—103、10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1475页。

③ 有的学者称之为“七月传话”,见FRUS, 1949, VOL. XIII, PP. 775.